

科技安全化与泛安全化： 欧盟人工智能战略研究*

宋黎磊 戴淑婷

摘 要：在安全化倾向的影响下，科技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越来越多受到权力关系、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中的安全要素约束。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领导力的竞争中，美西方国家正试图以技术发展军事安全能力，并从规范、制度、权力多个方面保护人工智能技术价值链与产业链的安全，隐藏着一定的泛安全化风险。欧盟倾向于将中国视为长期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对象，尽管在经济领域与技术全球治理领域双方具有合作共识，但对技术主权的保护仍是影响科技合作关系走向的重要变量。针对美西方通过泛安全化维护科技体系优势地位的行为，中国提出科技安全是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应尊重并关照各方合理安全关切，持续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关键词：安全化；泛安全化；科技安全；欧盟；人工智能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上海 200092

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D815；TP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4871(2022)04 - 0047 - 19

* 本文是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欧亚互联互通‘瓶颈地带’的机制博弈与中国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9BGJ041)和2021年同济大学学科交叉联合攻关首批示范项目“中美欧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全球化演进与区域化深入所引发的国际秩序的变革,高政治和低政治研究的传统边界被打破。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越来越多地占据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议题的中心位置,全球范畴的多重安全跨时空复合交叠,安全问题的联动性导致的泛安全化(pan-securitization)倾向日益显著。^①在泛安全化的形塑之下,科技领域的竞争与合作也越来越多受到权力关系、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中的安全要素约束。在科技议题的安全化中,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标志性特点。本文以欧盟的人工智能战略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欧盟人工智能战略的一系列文本和相关行动,剖析欧盟如何通过规范性关切、制度性约束和权力性行动来建构科技议题的安全化,深入分析欧盟对外话语中的“中国威胁”因素,探究欧盟如何以意识形态为起点建立技术安全信任标准并构建科技领域的“技术联盟”等具体动向,识别欧盟科技议题可能存在的泛安全化风险。

一、科技议题安全化的“理性”与“非理性”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安全”被学者们从内涵、外延等角度进行了广泛的解读。哥本哈根学派将安全的动态建构过程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引入到安全理论分析框架,其建立的安全化理论为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安全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方法。安全化的重要过程之一是选择被安全化的议题,随着冷战后安全意涵的逐渐拓展与丰富,以社会信息化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及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全球分布与国内分配不均的状况,催生了科技安全这一挑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和国防军事创新的至关重要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家需要保障科学技术进步并依靠科学技术提高整体国家竞争力,但是,科学技术因素与国家安全因素的相关联态势使得科技议题的安全化趋势近年来越发凸显。

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与奥利·维夫(Ole Waever)所言,“把某种东西称为安全问题或威胁,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改变了这个问题,并因此开始进入了安全化

^① 目前学界主要从“存在性威胁”界定的相对模糊角度解释“泛安全化”的形成原因,缺乏对“泛安全化”形成过程和其形成机制的分析,相关研究参见[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郭锐、陈馨:《“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第39-53页;张超、吴白乙:《“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载《国际展望》,2022年第2期,第19-35页;Benjamin Miller,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Should It be Redefined?”,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4, No. 2, 2001, pp. 13-42; R. Guy Emerson, “Towards a Process-orientated Account of the Securitisation Trinity: the Speech Act, the Securitiser and the Audi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22, No. 3, 2019, pp. 515-531; Martin Senn, “The Art of Constructing (in) Security: Probing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Securitis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20, No. 3, 2017, pp. 605-630。

的政治进程”。^① 对于“存在性威胁”的认知塑造是一个议题能否成功实现安全化的关键。而在安全化的过程中，行为体的选择带有主观性，即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安全化的行为体可能会制造或夸大威胁，造成过度安全化。^② 这种非理性的安全化行为会造成泛安全化的过度安全思维，人为地强化国家间“朋友”和“敌人”的身份，从而降低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包容性与灵活度。^③ 在科技议题上，科技创新研发政策的提出、相关产业投资的增加、对关键技术合理的安全审查等技术发展措施是国家发展的理性安全化诉求，对于增强应对技术风险冲击的能力、维护自身科技安全具有积极作用。而科技议题的非理性泛安全化体现为对科技安全概念的异化、对技术权力优势的无止境追求和对技术安全状态的过分执着。对科技安全问题的非理性泛化也同样体现在话语体系和价值观体系的建构当中。在大国科技竞争逐渐演化到技术标准制定权之争的新形势下，国家如果受不同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为争夺技术治理的主导权而主观夸大竞争对手“威胁”的话语，简单地进行价值观对立，则容易模糊技术安全边界，加剧国家间的紧张对立，造成趋势误判。

在对中国的身份话语上，美西方国家正在将中国的崛起构建成一个“存在性威胁”。目前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全面性战略竞争与合作的图景不仅仅在各个区域，也在各个议题上呈现出全方位、多议题交叠的非理性安全化特征。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是“在经济、外交、军事、技术等全方位领域都可以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持续挑战的唯一竞争对手”，正在“试图根据自身利益改变现行国际秩序”，以“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与利益相对立的世界”。^④ 欧盟认为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和谈判伙伴，同时也是欧盟追求技术领导地位的“经济竞争对手”(Economic Competitor)和推动替代欧盟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对手”(Systemic Rival)。^⑤ 日本

①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② 余潇枫、谢贵平：《“选择性”再建构：安全化理论的新拓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104-121页，这里第109页。

③ 张超、吴白乙：《“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第29页。

④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访问日期:2022-05-22;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2021-03-0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访问日期:2022-05-22;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2022-4-10], 访问日期:2022-06-01。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 2019-03-12,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 访问日期:2022-05-20。